

工业经济与企业管理

于光远 蒋一葦 等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工业经济与企业管理

于光远 蒋一葦 等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工业经济与企业管理

于光远 蒋一苇 等著

*

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门外百万庄南街一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 117 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787 \times 1092 \frac{1}{32}$ · 印张 $5\frac{3}{4}$ · 字数 126 千字

1983年6月北京第一版·1983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36,300 · 定价 0.74 元

*

统一书号: 15033 · 5203

出版说明

这是一本论文集。是一九八二年六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在与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国企业管理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于光远同志作为这次研讨会的顾问，曾在香港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为题作了演讲。此讲稿曾在《人民日报》（1982年8月16日）发表，现一并收入这本文集中。

本文集所收入的八篇文章，涉及当前我国国民经济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这些文章概括地介绍了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工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工业的改组 and 企业的联合，以及在计划经济为主的条件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以来所引起的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变化；并扼要地介绍了我国工业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的概况、我国国营工业企业民主管理的历史沿革与现状，以及现代管理理论、方法在我国应用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这些文章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发生的变化和发展的趋势。对于关心我国经济发展的海外学者来说，这些文章所提供的材料和见解是十分宝贵的，因此在香港的研讨会上，曾受到海外学者的高度重视。

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伟大号召。在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中，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高涨是首要的任务。研究这些文章所涉及的问题，仍然是今后经济建设中的重要课题。因此这本文集对国内广大经济工作者、研究人员以及经济院校师生，无疑是有参考价值的。为此特编辑出版以飨读者。

目 录

出版说明

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的科学研究……	于光远(1)
中国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	蒋一苇(9)
关于我国工业经济结构的调整……	徐传珍、陈慧琴(27)
市场调节引起的企业经营管理的变化……	刘春勤(55)
我国工业的改组 and 企业的联合……	邱靖基(78)
我国的工业经济责任制 ……	周绍朋(105)
我国国营工业企业的民主管理 ……	韩岫岚(128)
现代管理方法在我国企业中的应用与存在 问题 ……	沈鸿生(149)

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的科学研究

于 光 远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由领导这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管理这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制定并组织实施的。直到现在，似乎没有一个国家曾用一个专门的文件来公布它所制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但是这样的战略在这个国家的计划和为了实现这个计划而采取的各项重大措施中被具体化，并且在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中得到某种阐明和发展。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

研究和制定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科学工作。科学家们（包括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们）运用自己的学识和才能，就有关战略的各个重要方面搜集资料、开展研究、进行讨论、发表意见，为党和政府提供科学成果，是他们应尽的社会责任。

中国的科学家们这一年多来正是这样做的。他们思考了这方面的问题，介绍国内外有关资料，提出了使人得到启发的问题，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无止境的，但是一年多来的研究，在科学家中间也明确了若干观点，为今后的研究打下了一个初步基础。

现在我国多数学者主张使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样的术语。对此也有人提出疑问，认为经济生活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个部分，不应把经济和社会并列。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然而，如果因此把“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改为“社会发

展战略”，就不能突出经济发展的地位。如果因此改为“经济发展战略”，又会使经济以外的社会问题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经济社会”这样的用语，其实不过是“经济”和“经济以外其他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简称，并非把“经济”置于“社会”之外。这样的表达方式不论在中文和西方文字中都是允许的。

当然“经济发展战略”这个用语应该得到肯定，但它的含义要窄一点，它只是“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主要的部分。这一部分可以成为专门研究的对象，而不是用来替代“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中国科学家正在研究的，主要不是一般的关于发展战略的理论和原则，而是当前中国的发展战略。因此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明确中国发展战略的基本特点。

很明显，中国所需要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战略有原则区别的。它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的本性，适合于发展社会主义的要求。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发展战略。因此这样的战略具备以下几个基本特点：（1）这个战略必须以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增进他们的幸福为目标。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性决定的。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治家们虽然也常在口头上说这样的话。这或者出于善良的愿望，或者出于某种政治上的需要。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决定了口头上所说的“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等等战略目标，不可能是真实的。资本主义制度统治者实行的战略，其目标始终是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目标才可能真正是为了劳动人民的幸福。（2）这个战略所规定的发展目标，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基本制度的巩固，同时又包括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行政体制进行改革的内容。

因为在现行体制中会有一些不再合乎发挥现有生产力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东西，如果不对其进行改革，就不利于社会问题更好解决。而这些改革是具有重要意义的。(3)这个战略的实施必须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作出切实的努力把这种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真正发挥出来。只有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生活才能以较快的速度健康地向前发展。(4)实施这个战略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集中代表他们的利益和意志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和党领导下的政府。因此党的领导作用的加强，劳动者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在管理国家、管理企业中劳动者作用的提高，国家和社会生活向高度民主的发展，是战略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教育、科学、文化对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是非常强调的，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这又因劳动者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而有了更多一层意义。

中国所需要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当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中国国情中最根本的一条。这一点我们已经讲过。但是在中国国情这个概念中还包括其他方面的内容。如果说为了明确中国发展战略的社会主义性质，科学家们要做的工作只是明确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原则，那么为了使中国发展战略适合中国各方面的国情，科学家们所要做的工作乃是从大量有关中国情况的材料中，概括出对制定中国发展战略起决定作用的若干特点，并从中得出相应的结论。

把中国决定发展战略的国情的特点概括得准确和完全，并不是很容易的。因此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而且要区分哪些是最重要的，哪些是比较次要的。要明确哪

些是中国的特点，还要与外国作比较的研究。但这并不特别困难，困难的是从在实践上作出应有的结论。对于这些问题需要作更多的研究，在这里我只想从经济的角度讲讲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中遇到的一些特殊问题。

第一，中国是一个拥有十亿人口，即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特别大的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当然与一个中等大的和一个比较小的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由于国家特别大而带来的发展战略的特点是多方面的。举例来说，两个生产力水平（可以用每人平均占有的机床数、发电量、运输能力等劳动资料以及劳动者的平均技术和文化水平来衡量）差不多的国家，大国的国力比小国就大得多，因而抗拒灾害、克服困难方面的能力也就大得多，当需要集中巨大的人力物力兴办某一事业的时候，也比小国优越。另一方面在一个大国普遍进行一项改革或者贯彻一个政策、一种措施，却又因从中央到基层之间层次较多和各地区情况的差异等原因，比中小国家要花更多的时间。也因为国家特别大，在这样的国家中，发展进出口贸易虽然是必要的，但对生产来说，国内市场的地位显然比中小国家要重要得多，社会需要也应该设法大都由本国的生产来解决。在这样大的国家中建立起包括所有部门的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必要性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第二，中国的国土可以分为两部分，西部和东部。西部包括西北干旱地区和青藏高寒地区，占大陆面积的52%，而人口只有全国人口的6%。东部是季风地区，面积占大陆面积的48%，而人口却占全国人口的94%。东部地区由于经济比较发展、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较高，这个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所占的比重更大于其人口在全国的比重。这种

情况决定了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问题。

(一) 既然人口密度高的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全国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我们就要首先依靠这个地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因而就需要根据这个地区人口多、土地少（特别是耕地少）、经济文化水平高的特点来考虑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由此而应该得出的结论正在一个一个地明确。例如：要在这个地区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包括更好地利用山地、水面以及零星土地，生产出更多的食物和工业原料，并大力发展土地产品的加工业和农业服务业；要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和农业，发展知识密集型的各种行业；要重视发展各种服务业；要进一步提高这个地区的经济、技术和文化水平等等。

(二) 既然中国西部有如此辽阔的国土尚未开发，既然在那里有如此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矿产资源）还没有被利用，那么我们就应该看到，这样一块待开发地区的存在，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长期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当前，我们就要研究在充分发挥东部地区作用的同时，很好地研究对西部地区的开发，研究如何使东部和西部的建设结合起来。

第三，中国各地区之间，经济上技术上显著地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存在于比较发达的地区与比较不发达的地区，也存在于上海等若干沿海地区的特大城市与内地大中城市之间，存在于内地大中城市与本地区中小市镇之间，存在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这种情况决定了经济协作与技术转移的战略意义。把这个潜力利用发挥起来，将使不发达地区的经济，从而使整个中国获得一个很大的发展。在这里也包含进一步提高先进地区的经济技术水平的伟大意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后进地区不断地获得从先进地区转移来的技术的利

益。还由于城市是周围地区的中心（当然许多大城市的作用是超出地区性的），从提高广大农村的经济文化水平来讲，城市建设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四，中国十亿人口中，八亿居住在农村。农村居民经济生活——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变化，对整个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农村作为食品等工业原料的农产品供应基地，它在经济上的发展是中国整个工业城市发展的保证。在这方面，今天有很大的潜力。中国的工人、农民和科学工作者，根据他们长期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创造出许多充分利用土地取得更多产品的有效的方法和措施。更多的方法还在不断探求中。但是，仅仅采取已经可以作出决定要采取的那些措施，就可以大大增加这个方面的社会财富。同时，农村是中国工业品的最大市场。八亿农村居民，每人每月平均增加一元收入，每年就增加96亿元购买力。因此要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就要特别重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就要特别重视农村的建设。每一个能够普遍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生产措施，都应该受到极大的重视。

第五，总的来说，中国和发达的国家相比，技术水平上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运用一种现成的技能比从头发明创造它，不知要节省多少劳动和时间。马克思讲过，牛顿发现二项式定理不知花了他多少时间，现在初中学生只要上一堂课，就把它学会了，二者相差不知道多远。中国技术与外国技术的这种差距使中国有可能运用外国最先进技术来发展本国经济。水平落后于外国，这是我国的一个弱点，从另外一个方面，又可以看作是发展中国经济的一个有利条件。同时，当前的国际形势也有利于中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坚持对外开

放政策是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根本精神。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政策并非互不相容。正如赵紫阳总理在题为《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我们要利用两种资源，首先是国内资源，其次是国际资源；开拓两个市场，首先是国内市场，其次是国际市场；学会两套本领，一是管理国内经济的本领，二是开展对外经济贸易的本领”。报告中所提出的要求就是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包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同时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这一条中产生的。

以上只是从经济的角度作了一些讨论，关于经济以外的社会主义生活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包括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也有带有战略意义的。例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既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家知道，精神文明既包括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又包括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精神文明的基础，但是精神文明的建设对物质文明的建设起强大的反作用。关于精神文明建设例如关于教育、科学等发展的战略意义，经过近几年一再强调，人们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这仍是一个需要继续进行研究、继续阐明、继续强调的观点。在这里我说的“教育”，既包括一般的文化程度、知识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平的提高。在这里我说的“科学”，既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工、农、医等各个科学部门，也包括经济科学、政治科学、管理科学等社会科学部门，而坚持、发展、普及马克思主义更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象

我们这样提出精神文明问题，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创举。我认为，把精神文明问题看作是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发展战略研究中的一个崭新的思想。

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个概念中，包括战略目标、战略方针和实现战略目标应采取的步骤等等。因此，今天我们在研究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时候，不能不研究今天——本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着任务。在今后一定的时间内我们还要继续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建设的方向，赵紫阳总理在去年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作了详尽的阐述，而更为具体的步骤将在中国第六个五年计划中作出规定。

战略在这里无非是指重大的带全局性的甚至决定全局的谋划。由于不同的范围各有自己的“全局”，因此也就有不同范围内的战略。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指的是一个国家总的战略。各部门、各地区还可以而且应该有自己的战略。例如属于部门的，有工业发展战略、农业发展战略、科学技术发展战略、对外经济关系发展战略等等；属于地区的，有某个区域、某一个省、某一个市的发展战略。这些对于某个部门、某个地区来说是全局的问题，因而被称之为战略问题是可以的。但是对于部门和地区来说是全局性的东西，对于全国来说又成为局部的东西，它们只是全国性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下的各个局部，它们是在这个总的战略思想指导下的局部性的战略。当然整体总是局部构成的，离开了各个局部也就没有了整体。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要以这样许多局部性的战略来具体化，来作为补充，所以在讨论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时候，常常延伸到这类局部性的战略问题是很自然的事。不过在这里我们就不去涉及它们了。

中国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

蒋 一 苇

在讲这个题目之前，有必要对体制改革的概念做点说明。

我们国家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这里提到的改革，指的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或者说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这里说的体制，主要是管理体制，它的涵义不同于经济制度。因此不能把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说成是经济制度的改革。

我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国家的根本制度，不存在什么根本上进行改革的问题。当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断充实和完善。比方说，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这是不可动摇的，但在现阶段，不仅要鼓励和扶持公有制中的集体所有制，使其有所发展，而且还要以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的重要补充。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还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在中国投资，并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最近公布的宪法草案还有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法律规定。这些说明我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将是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但是，就全国范围来说，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将占绝大部分，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这条原则并没有发生变化。

经济管理体制指的是对国民经济活动，从宏观到微观如何具体组织的问题。它的本质也属生产关系范畴，但它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组织方法和组织形式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我们必须坚持，在这个前提下，管理体制是完全可以也必须不断总结经验，进行改革，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正因为这样，我们党的六中全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正是努力探寻这种具体形式。

中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尽管还处于试验的初期，已经引起世界的注视。但有些外国学者和报刊记者，往往把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有意或无意地引伸为经济制度改革，并作出种种揣测和判断，有的以为或者希望中国会放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如果不是戴着某种有色眼镜看问题，至少是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太缺乏真正的了解。

经济管理体制包括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等各部门的管理，也包括财政、税收、银行、劳动等各方面的管理。我这里只着重谈工业以及与工业有关的体制改革问题。具体来说，又主要谈的是国营工业的管理体制问题。作为学术讨论，谈的只是个人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提出来和大家共同研讨。

一、为什么要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两个极其有利的条件：一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有可能由国家统一领导全

国经济，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克服社会生产、流通、分配的无政府状态；二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劳动人民为自己的利益而劳动，因此有可能极大地提高劳动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这些，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但是，要把这些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必须有一个与公有制相适应的合理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而且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发展，这种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也要不断改革和完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实现了公有化的伟大革命之后，在管理体制上必然要有一个探索和完善的歷史过程。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新兴的社会制度，在组织管理上不完善，甚至走弯路，出现一些重大的曲折或挫折，用历史的眼光看，都是不足为奇的。正象正在成长的孩子走路一样，他摇摇幌幌，甚至跌交。如果一个老头嘲笑小孩不如自己稳健，甚至判断孩子永远赶不上自己，那可笑的恰恰不是孩子而是老头自己。

我国全国解放后，面对的是一個被破坏得百孔千疮的经济局面，依靠党的领导和国家采取统一财经的措施，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使国民经济恢复到历史的最高水平。以后顺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基础，又在国家集中统一领导下，运用当时有限的资金，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以后有些时候由于政策上的偏差，我们在经济发展上遭到一些挫折，但是能够比较迅速地进行经济调整，克服困难局面，也是依靠了国家集中统一领导的力量。

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至少有以下几点明显的好处：

第一，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才有可能改造旧的社会经济制度。

第二，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才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生产，满足需要。

第三，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才有可能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资源，运用有限的资金进行重点建设。

但是，在经济管理上采取过分集中的办法，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里，采取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客观上是有困难的，实践也证明会带来许多消极的后果。

第一，高度集中的管理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发展中客观存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中央决策的误差会对国民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我国目前存在的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情况，就是一个证明。

第二，高度集中的管理容易使生产和流通出现呆滞现象，阻碍生产技术的发展，不能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

第三，高度集中的管理必然会使地方和基层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受到束缚，特别是企业，它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生产力的直接发挥者，企业失去应有的活力，就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四，与高度集中的管理相联系的“大锅饭”、“铁饭碗”制度，不能很好地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往往变成平均主义，严重阻碍劳动者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充分发挥。

如何建立一套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又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管理体制，不是现在才提出的问题。早在1956年，我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以后就提出了。

毛泽东同志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